

选择了创业,就不能轻言放弃(上)

◆ 冯仑

创业是一种人生态度

创业是一种折腾的人生态度,这种人生只能赢不能输,非常辛苦。只要坚持了创业的基本原则,一般就能收获长远的利益。小买卖未必不能成长为大买卖,只要创业,多半就会有前途。

我当初选择创业比较被动,完全是因为意外的原因导致的。我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,当过公务员。那时我的人生设计非常简单,一路往上走,熬资历,熬房子。我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朋友基本没有下海的,他们现在就是既有房子,也有了官职,生活得挺惬意。我是一不小心阴差阳错就从比较安稳的生活轨道中脱轨了,开始做生意,成为“皮包公司”老板,然后“野蛮生长”,变成一个“黑心开发商”,然后再变成“理想丰满”的自己。是生活把我蹂躏成这样的,不是我把自已塑造成这样的。

创业,不能太年轻。先稳定,再求发展,才是硬道理。你刚进入社会时很青涩,只有热情,很少成功,经常遭遇挫折、白眼、无奈,这是刚开始。到中年的时候,你就多少有一部分自信、自由,社会资源也多了。

在步入社会的初期或者创业初期,姿态要低,弯腰、低头、下跪,是基本功。只有先把自己压缩为零,才能从零逐渐舒展开来。

我有一个朋友,做纺织品出口,现在生意做得非常好。他腿有点残疾,就像郑智化一样。郑智化讲他是从底往下看人生。人从底往下看人生和从上面看不一样,我们多数人是平着看人生,有些自以为很牛逼的人是从上面看人生,从底往下看就是

长期忍受被别人摧残、歧视。我这个朋友也有类似经历,他对外部特别敏感,他一直都处于一种侍奉人、帮助人和配角的角色。

有年轻的网友说羡慕我目前在“乐山乐水乐自在,亦文亦商亦从容”,他想像我这么潇洒从容,却没钱,去挣钱又从容不了,必须低着头,老老实实地先做自己本分的工作,有时候被领导批评了,被同事排挤了,也得忍着,感觉挺憋屈的。其实,他的这种状态我也经历过,只是大家都没看到,大家看到的只是现在相对成功之后的我。

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,起点特别低,很困难,许多人都得罪不起,很多事都难以处理,很多委屈要受,也没钱。即使是再小的客户,我们都得好好为人家服务。我在地铺上睡了11年,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,然后跟自已说,如果我折腾不起来,我就不睡到床上去。就这样,我在地铺上睡了很长时间。我意外发现睡在地上有很多好处。那个时候,我把什么都扔地上,座机电话也扔地上,别人进来一看,就很能体会到我所处的位置。有一个债权人是我的领导,我带他去看我住的地方,他看后感触很大,说:“我相信你能成功,另外,你是个好人,没拿着别人的钱不还,然后去消耗、消费、奢侈。”我当时就这么低,别人看到我姿态这么低,看到我这么委屈自己,也没什么可讲的。人有三个姿势:趴着、蹲着、跪着。创业初期,这三种姿势都可能遇到,想站着很难,很多时候是趴着。那时没有一个人不借钱,借钱要遇到两大挑战:第一是否诚实,第二是否能弯下腰来。人都希望自己站着,但人生还需要各种姿势,跪着、

本书作者冯仑,集数十年人生感悟与商界经验,深入浅出谈理想、圈子、地产、创业、金钱。



蹲着也是一种姿势,有时甚至得趴着。我经常安慰自己,就让自己蹲一会儿吧,蹲着也挺好。所有创业者一开始能借到钱,都需要诚实、不怕自己弯腰,同时能忍受被别人看不起,而且不把自己求人当成委屈。这也是别人借给你钱的根据。有了这个,才能完成第一步的原始积累。

要像女人对待终身大事一样选择合作伙伴

今天人们创业时都会有合作伙伴。马云他们是很成功的,十几个人最后做得很好。以前也有不需要伙伴,一开始就自己一个人创业。20年前我跟刘永好各自都在做生意,那时候只有非常少的人做生意,这些人慢慢发展成江湖大哥,他们的

模式就是一个人当老板,下面一堆职业经理人,就像一个英雄带领一群人打天下。但现在,创业仅靠单打独斗已经很不现实了,每个人的能力有限,找到好的合作伙伴,已经成为创业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。

找合作伙伴,要像女人找对象,而不是像男人找对象一样。女人的思维是正经认真,而男人的思维则是娱乐快活。选合作伙伴,就像女人找终身伴侣,首先要价值观一致。价值观这个事重要在哪儿?重要在于人之间相同又不同,坐在一块儿聊天吃饭是相同的,而一出门思考的事,做出的判断不一样。找合作伙伴,不能光想着自己要赚多少钱,只要认准了这个人,就可以不谈钱,最后挣钱当然是最理想的,但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凑合的事儿,如果你有钱、我有关系,咱俩先对付着弄了,这事儿最后都会掰。所以找合作伙伴,对双方的价值观需要更多的审视、更多的讨论,不完全是你有钱、我有关系、他有产品,最后大家凑合一块干。这样的合作关系,短时间可能还好,但是长时间合作就会碰到各种麻烦。找合作伙伴要有长线规划,有过日子的想法,有同甘共苦的思想准备。

选创业伙伴相当于我们找一个精神上、未来发展方向上,以及生活方式上的伙伴,所以是非常重要的。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,大家就可以同甘共苦,集合几个人的力量化解危机。即使分开,也不影响大家继续做朋友。今天凡是做得还可以的创业者,当初都有一些伙伴,这些伙伴没有变成他们发展当中的负面因素,反而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万通“六君子”当初在一起的时候,

大家有一致的目标,每个人在这个大家庭里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——他在,就是百分之百;不在,就是零。后来,大家解散了、分手了,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,“江湖方式进入,商人方式退出”,但我们再见面也还是朋友。

创业像女人的一生,要安全感也要良好的沟通:首先要懂得控制风险,不能逞一时之强,把所有家当赌在这一件事上;还要像伴侣之间过日子一样,留神细节问题,讲究沟通的技巧,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彼此理解。

女性思维一定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去找快乐,而男人经常是冒着风险先快活再说。做企业也是这样,你究竟是图一时之快,还是在风险安全控制下享受那种小乐趣?很多工程师出身的创业者,在安全的情况下一点点做技术改进,最后获得大成功。而像我们这种比江湖的创业者就变得不那么精致,喜欢追求一时的扩张。

创业需要女性思维,女性渴望沟通。买卖本身就是比较闹心的事儿,创业伙伴之间的沟通就跟过日子一样,往往都是因为沟通不好出了问题。创业时,要把握好和合伙人、客户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。沟通有很多细节和技巧,一定要特别留神,你不留神就会误判。公司长期发展主要就是相处,和合作伙伴的相处,和客户、和上下级之间的相处等。首先审视对方,像对待终身大事一样找到合作伙伴;其次,不能太逞一时快乐,要在安全情况下去寻求一生的幸福;最后,既然是相处,沟通就非常重要,要习惯于沟通,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彼此理解。

文学的生命——我和我的作家朋友

修晓林

12.一道亮丽景观

李济生的川音抑扬响亮,宫玺的语调沉稳细腻;老李谈事,往往是慷慨激昂、喜怒见于色,而宫玺则是面带微笑,条分缕析、层层递进;两人都沉浸于往日苦难、今日辉煌之中,引发无限感慨和由衷赞叹,同时也对未来中国寄予无限希望。

文学室的整间大屋里,一边是六位编辑在紧张工作,而另一边的书桌旁,有两位银发老人在旁若无人、激情四溢地高谈阔论、交流心声,这是那段时间,绍兴路的一幢楼房里,引人注目的一道亮丽景观。而作为后辈后进的我,则会在他们无拘无束、淋漓尽致的谈论中,了解到许多,学习到许多——

“生活的感受是第一位的,是最新鲜的,是别人不能代替的。”“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市,已经给他重建墓碑,上面写着科学、民主。历史就是这样,现在说好,以后不一定好,现在说坏,以后不一定坏。应该给陈独秀正确的历史地位。”“贾植芳的那篇文章写得太好了,精彩,幽默,书是借来的,我恨不得把它抄下来,但是太长,不抄吧,又怕记不住。”“文化,不仅是多读几本书、多考试几次,关键是人的道德修养。经济可以十几、二十年搞上去,而文化,要一百年、两百年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、精神氛围。”

年近的前辈们在一起,定然会有关于老年生活的话题——

2011年11月,上海文史馆组织馆员去江浙一带旅游,李济生也去了,回来家人一问:去哪里了?却是答不出。老李嗓门响亮地说:“管他了!老头老太下车上车,看看就走,也不晓得玩得是什么地方,只要去得了就好。”“年纪大了,看了就忘了。都搞不清楚报上写得是什么。”“真是没有办法,一年不如一年了。”“自己老得不像话了,看都不能看了,从来不照镜子。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。”“老人,只要活得开心就好。要活得长、死得快。”

对我来说,前辈们关于“年岁不饶人”的话语,对于不久将来,必然会到来的老年生活



和身体状态,也是有了更加清楚的“提前预知”,这肯定是有利于自己现实又冷静的“抗击打”能力。

我和老李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,又有机会担任他著作的责任编辑,这是我编辑生涯的幸福。李济生的这本《怀巴金及其他》,属于深受作家称赞、上海作协资助出版的“上海老作家丛书”。我看了书稿后,觉得济生先生的这部稿子,以亲人的身份,回忆了巴金以及与巴金同时代不少文坛名家的交往,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,尽管不具理论色彩,但以直性情强、感受层次深入而见长。晚年的老李,仍是勤奋读书,笔耕不辍,这种活到老,学到老,创作到老的精神,让我们这些小一辈编辑深受感动。

自2013年初起,因为身体原因,老李就不来出版社与宫玺先生聊天了。老李的女儿小瑞说:“爸爸确实老了。我生怕他外出会走迷路。”九十八岁的济生先生,记忆力逐渐衰退,与人见面,不说话的时间多。在学识、为人、编辑能力方面,我从李济生先生身上学到许多,受益许多。老李的认真、豁达、淡泊名利还有他的风趣幽默,会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。

第一次见到钱谷融先生,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那间好宽好大的阶梯教室里。

1979年初,刚从云南边疆回到上海、进入出版社工作的我,痛切地感到自己文学和科学知识的贫乏,时时在心里提醒自己:要像蜜蜂一样采撷芬芳的百花,酿取营养丰富的蜂蜜;要像海绵一样,无穷尽地吸收各种知识;要成材,就要拼命地学习和思考!在友人那儿得知,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被录取的第一批中文系学生,已经在华师大这座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刻苦攻读,中文系里,就有我所认识的孙颢、周抗美、陈惠芬、赵丽宏、王小鹰、沈乔生、孙联中等。能与他们一起听中文系的大课,是“补课充电”的极好机会!

那天是听钱谷融先生讲“曹禺和《雷雨》”。让我感到与其他教授讲课氛围明显不同的是,钱先生的授课完全是在讲故事,他的表情和身体姿势,都似乎在用一种随意散淡的语言告诉莘莘学子:“怎么讲是我的事情,听不听得进是你的事情;怎么猜测你的学业潜力是我的事情,能不能成材是你的事情。”

26.秘密商量起诉提案

接着章、邹、李、王、沙逐个进入会客室接受讯问。沙千里在《七人之狱》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次讯问:临到我,我便跑到会客室。问话在后半间举行。一只原来的小圆桌作为“问案”。科长和书记左右分坐着,我坐在他们二人的中间,面对着后面的玻璃窗。科长前面的桌上放着许多案卷,因为台子过小放不下,其余还有许多的文卷,放在靠墙壁那个长沙发上。他手里也拿着一卷,向我缓和地问着,我依着问逐一答复。我想假使一切法庭都能做到如此,我相信“冤狱”也许可以减少许多。

讯问者问:“职业界救国会你在内吗?”沙千里回答:“我是发起的一分子,现在是理事之一。”讯问者又问:“还有谁是理事?”“很多,但是在‘救国有罪’的环境里,我不愿宣布。他们都是有位位,很有学问,赤诚爱国的分子。如果今天宣布救国不是犯罪的,那么我明天就可以宣布。”沙千里从容回答,把讯问者的探问挡了回去。“会员有多少?”讯问者不善罢甘休,继续追问。“一两千。同情而未曾加入的,多到不可计算,并且一天天在发展。”讯问者继续探问:“有没有共党分子?”沙千里干脆回答:“不知道。救国会素来主张:不问党派,不问职业、地位,不问信仰;只要主张抗日救国的,都应该团结起来。所以职业界救国会里,在职业方面,有经理、老板、买办,也有伙计、学徒、老司务,以及一切自由职业者如医生、律师、新闻记者等,在信仰方面,有基督教、天主教,也有佛教和反宗教者,在党派方面,除国民党员外,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宣布,他们也不肯宣布,救国会里无从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党派。所以有无共党分子,简直不知道。即使有了,也和国民党员一样,大家一律以抗日救国为目的,不是实行某党某派的主义或政策,当然不必拒绝,况且他们也不告诉救国会说他们自己是共党。脸上或外表上又无共党的标志,所以无从知道有无共党。”

讯问者又问:“火花读书会你加入过吗?”沙千里又是一个“不知道有火花读书会这样一个团体”。讯问者提醒他:“它是职业

界救国会的一个会员。”沙千里回答:“职业界救国会只有个人会员,没有团体会员。”

南京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六人感到棘手,原先试图秘密逮捕他们,送军法处关押,被公众舆论揭开后,一下子变得被动起来,手足无措。无奈,南京政府只能决定把六人转移至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受审。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电告江苏省高等法院首席

检察官孙鸿霖赴宁,秘密商量对六人的起诉提案,指派资深检察官俞赞年负责对六人的起诉。

12月4日,六人刚吃过午饭,正准备稍事休息。门被推开,警察局司法科长高声宣布:“立刻动身到苏州去!”六人一直等着“发落”,一旦突如其来宣布了,有些措手不及。“可不可以给家属挂电话,免得惦着。”“不行,马上动身。”“依法可以和家属再见面,送些铺盖。”“上峰指示,不行!”司法科长一口回绝,照例是两个字“不行”。王造时气愤地嘟囔着:“走就走,简直没有法律了。”边嘟囔边动手整理杂物,包卷起铺盖。

突如其来的决定令邹韬奋十分愤慨,情绪有些激动,看见沈钧儒正麻利地卷好铺盖,也回到左边的小房间打点行李准备上路:“卷铺盖该我们滚蛋了!”

大房间里的王造时、李公朴、沙千里的行李已卷好,正趴在桌子上给人家留条子,告诉去向。警察局长蔡劭生生怕六人拒绝移送,跑来给各人打招呼,一再解释临时接到命令,不无唐突,望诸位海涵。

六人来到院里,上了大警车。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几个侦探挤进车厢,把车子塞得满满,像沙丁鱼罐头。车子由徐家汇路绕中山路驶向锡沪公路。

他们透过窄小的车窗朝外眺望,突然一面太阳旗跳入眼帘。密密麻麻的建筑中,太阳旗迎着风,呼啦啦飘扬。如果没有旗帜的牵引,它会疯狂地飞上天。旗上的猩红色太阳图案与中午天空的灰蓝相映,有一种灼痛双目的痛苦,愤怒油然在六人心头升起。不知是谁问了一句,“这是什么地方?”“丰田纱厂!”

车内没有声音,沉默得令人难受。

“快到真如了吧?”“已在真如地界了。”

长河秋歌七君子

潘大明

